



JCLE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2, No. 1, 2026, pp.160-168.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60114hitbi>



华文教育制度史之外的思想暗线——兼评梁秉赋《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

周 霞 (Zhou Xia)

摘要: 本文以梁秉赋《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为研究对象,引入隐性课程理论,从国际中文教育视角重新解读了制度史之外的思想暗线。研究认为,语言教育内在地伴随价值观念与文化内涵的传递,隐性课程在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最后总结新加坡经验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重视隐性课程、坚持文化传播的平等对话、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

关键词: 新加坡; 华文教育; 隐性课程; 文化传承; 国际中文教育

作者简介: 周霞,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电邮: 2668349372@qq.com。

Title: The Hidden Ideological Thread Beyond Institutional History—A Review of Liang Bingfu's *Research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Liang Bingfu's *Research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interprets the hidden ideological thread beyo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hidden curriculum. The study holds that language education is inherently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mission of valu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of Singapore's experienc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cluding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hidden curriculum, adhering to equal dialogue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balancing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Singaporean Chinese educatio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idden Curriculum;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uthor Biography: Zhou Xia,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shu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CSOL). E-mail: 2668349372@qq.com.

引言

纵观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既是海外华人社会文化遗产与在地适应的缩影,更是多元文明交融碰撞下语言教育变迁的典型样本。梁秉赋老师的《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2020,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梁著”),系统地梳理了新加坡华文教育从起源、兴盛到转型的完整脉络,既清晰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华文教育的制度形态、政策更迭与办学实践,也将制度变迁与社会语境、思想思潮初步勾连,为我们研究华文教育提供了新的启示,其中第四章关于华文教育的影响的讨论,触及了一个非常值得追问的问题:20世纪的上半叶南渡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华文教育,将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植入南洋学子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思想启蒙又与新加坡战后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构成了怎样的血脉渊源?

本文从国际中文教育的视角出发,引入隐性课程的理论,重新解读梁著中在华文教育史之外的思想史暗线,探讨华文教育在文化遗产、思想启蒙等方面的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以期丰富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维度,同时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新思路。

一、两大核心贡献

梁著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以严谨的史料考据与清晰的叙事逻辑,完整呈现了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貌,对于我们了解新加坡华文教育做出了两大贡献。

第一个核心贡献,构建了新加坡华文教育身份转型的完整叙事线索,清晰勾勒出华文教育从中国的侨民教育,逐步转变为新加坡的国民教育,最终成为国家双语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件的三阶段转型历程,这一点同时也是梁著贯穿全书的核心叙事逻辑。

第一阶段为侨民教育时期(19世纪末-1950年代),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教育本质上是中国教育的海外延伸,并未形成独立的在地教育体系。据梁著详细考证,彼时的华校多由华社宗亲、地缘组织集资创办,其教材、师资、学制均与中国国内高度一致——教材多直接从中国运入,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灌输侨民家国情怀为核心;师资则以中国南渡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不仅承担着语言与文化教学任务,更带来了中国国内的思想思潮与价值观念,学制也沿用中国的中小学体系,核心目标是培养心系故土的海外侨民。(pp. 19-24)。

第二阶段为本土化转型期(1950年代-1970年代),随着新加坡在政治上逐步实现自治与独立,

国家力量通过出台教育政策的方式,全面介入华文教育,逐步打破了华校自给自足的局面,将华校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pp. 51-71)

第三阶段为华文教学时代(1980年代至今),华文教育的身份在这一时期再次发生转变,为与前期区别开,书中将这一时期为华文教学。(p. 74)双语政策之下的华语或者汉语,从新加坡华人的母语降为第二语言,其核心功能也从文化传承转向实用工具,华语教学重点从传统文化浸润转向语言工具训练,此时华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备双语能力且能适应全球化的应用型人才,华文教学彻底融入国家双语教育体系,成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与多元民族和谐共处的一个重要组件。

梁著的第二个核心贡献,是突破了单一的政策叙事或者制度叙事,以扎实的史料呈现了政府、华社、华校三方在华文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互动博弈,这也是本书中最具说服力、最扎实的部分。梁著并未将华文教育的制度变迁简单归因于国家政策的强制推动,而是细致梳理了三方力量的拉扯与妥协,通过多个具体案例展现了互动博弈如何影响华文教育的发展轨迹。

在侨民教育时期,博弈主要体现为华社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张力:殖民政府对华人教育采取不管制但是同样不支持的态度,虽然它愿意给予华校津贴,但寄望通过这样的资助能使它得以影响甚或管制华校(p. 23)。维持华校的人士因此对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与管制都满怀戒心。但也正因为英国殖民政府不愿意设立官办的华文学校,也促成了华校遍地林立的局面。

在本土化转型期,博弈变得更为复杂。核心是政府的国民教育诉求与华社、华校的文化传承诉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华校一直以为主要依靠自身经营维持,且不一营利为目的,又不愿意接受殖民政府的资助,所以经费并不宽裕。彼时战后局势也让大英帝国意识到,它不可能对原来的殖民之进行长久的统治,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考量,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强势推行一项名为“十年教育计划”的政策。当局希望通过这一“十年计划”落实免费的全民小学教育的同时,改变学校性质、重塑学童的国家认同意图。

梁著中以张瘦石与李光前的争论详细描述了当时新加坡中文学校此间的挣扎,彼时对华校性质的“守”与“放”的抉择,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两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对自身和下一代的身份归属、认同意识和效忠观念的定位。但是进入1950年代以后,国际间冷战格局业已形成,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联邦自治与独立进程展开,种种的风云变幻,使得华侨学校的坚持越来越没有着力点,把华校发展为华裔新加坡人的母语源流学校,已成为不得不然的选项。加之,南洋大学被合并,以及与升学相关的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实施,华校同样需要兼顾学生与家长的未来发展期望,1986年华文溯源体系最后一批学生毕业之后,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校就此走入新加坡的历史。虽然华校不复存在,但是对学生进行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教授的工作并没有中断。

在双语政策时期,博弈的焦点主要在于政治上华文教学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空间之间错位。政府侧重华文的工具性,不断优化双语教学政策,平衡华文与英语的教学比重,但是对于大部分华族而言,华语并非他们在职场中最广泛使用、深度运用的语言。在以英语为强势语言的社会环境中,华文的生命力要得以维持,必须确保在华文师资和华文媒体等关键领域,能有数量足够且素质合格的生力军填补和接班。

总体而言,梁著通过身份转型的核心叙事与多方互动博弈的细致分析,完整呈现了新加坡华文

教育的制度变迁全貌，还原了梁著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解读逻辑与研究框架。正是梁著清晰呈现的身份转型历程，让我们能够进一步追问，在这些制度变迁的背后，隐性课程如何传递思想、塑造认同，华文教育又如何通过这些隐性维度发挥其未被制度明确界定的社会功能。

二、华文教育的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教育家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在1968年提出，其核心内涵是指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通过教师言传身教、教材文本渗透、校园活动实践、环境氛围熏陶等多种途径，潜移默化习得的价值观、态度倾向、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后来成为教育社会学的核心分析工具，为解读教育实践中非制度化、非显性的教育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梁著的核心在于华校教育的历史变迁，但是散布于其史料中有关华校师资构成、教材来源以及学生言论的描述，为我们了解华文教育的隐性影响撕开了幕布的一角，启发我们运用隐性课程的分析框架去探讨新加坡华文教育所承载的社会功能。

本节内容将从教师、教材、校园活动三个维度展开，以严谨的史实为基础，确保分析扎实、有迹可循。

（1）教师作为隐性课程的中介。梁著明确提及，侨民教育时期的新加坡华校，“其师资（尤其是中学教师）更是大部分来源于中国”（p. 56）。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间，由于政治与战争的缘故中国的文化与知识界人才不约而同地大规模迁徙到南洋地区，有研究指出，在1880年至1949年间，从中国南来新、马并在当地从事文学创作的，有121人之多。这里的统计虽然是针对新、马文学的自中国而南来的作者，但是这一数据对于当时中国文化与知识人士整体南渡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1920年代的南渡浪潮，其高潮在1927年发生的“宁汉分裂”事件前后。1930年代的另一波南渡潮则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尤其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兴起后。这里面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些南渡的文士大部分成长于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他们正是直接受到“五四”思想影响的第一代与第二代读书人。

从中国南渡至新、马的知识文化人士中，有一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比如活跃在新闻界和文艺界的郁达夫、胡愈之和王纪元等。到华文学校去教书的知名人物更不少，比如老舍、吴天（洪为济）、高云览、汪金丁、杨骚和王任叔（巴人）等。这些广为人知的中国作家，仅仅是南渡文人中的代表人物而已，和他们一起汇合成南迁浪潮的，是人数众多但是姓名不为人所知者。

这些南渡知识分子大多亲身参与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深受五四思潮的深刻影响，他们并非单纯的语言传授者，更成为五四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向华校生传递的核心中介，其在课堂内外的言传身教，构成了新加坡华文教育隐性课程的第一重运行机制。我们在老舍的《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可以窥探一二：

在新加坡，我实在一个中学里教几点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得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

文章没有清晰的描述华校学生当年的言与行，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学生们在思想上探索上的劲头，可能不成熟、不清晰但是热情与勇气兼具。到了 1950 年代，接受过华文教育的新生代们，他们对于自身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那是一面对封建残余的铲除，一面是对殖民地主义者手里的扑灭。因为，这些是时代的绊脚石，假如它们存在一天，美丽的明天便受到严重的威胁。（《星洲中正中学第十一届高中毕业班（丙己组）毕业特刊》之《我们的话》，p. 1）

人是环境的产物，莘莘学子们所展现出来的思想面貌必然是与他们在学校所收到的教育有关。正是这些成长于深受五四文化思潮影响的南渡知识分子以“教学”为载体，将民主、科学等理念，逐步带入南洋华社与华校课堂。《联合早报》2019 年五四百年专题报道也补充证实，白话戏剧早在 1913 年就已传入新加坡，演出者多为养正学校等华文学校的师生，许多华校明确将戏剧作为推动新思想的重要媒介。而这一实践的主导者，正是来自中国的南渡教师——他们通过戏剧指导、课堂讲解、课外交流等方式，将自身所秉持的五四思想，潜移默化传递给每一位华校生，实现了思想浸润的隐性教育。

（2）教材作为隐性课程的“文本载体”。梁著经过细致史料考据后指出，侨民教育时期，新加坡华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大体与中国国内学校所使用者无异”（p. 22）。这一判断并非孤立，而是得到了教科书史研究的充分佐证，也进一步印证了梁著史料的扎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馆长，李金生，在其教科书史研究中明确考证，二战以前，新加坡华校所使用的教科书“绝大多数都由中国输入”，教科书的编纂者均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教职人员，主要的教科书出版者是创设于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它们编写的小学、初中与高中的教科书，包括了国文（国语）、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风行东南亚各地¹。

即便到了 1930 年代后，出现了专供南洋侨校使用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其内容也大多“依照中国国内教科书系列为蓝本改编而成”²，核心选文、插图与价值导向均未脱离中国国内教科书的框架。李金生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教科书，“由最早的启蒙功能，逐步转向后期作为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宣传工具”³，二战前新马华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深受他们所读的教科书

¹ <https://sfcca.sg/2025/03/08/走过一个半世纪的新加坡华校教科书/>

²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anguage-education/nanyang-characteristics-in-textbooks-of-chinese-medium-schools-1936-1957/>

³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anguage-education/pre-war-republic-of-china-textbooks-and-the-southeast-asian-chinese-1912-1941/>

影响，他们被教育为爱国（中国）、爱民族（中华民族）、人格正直的热血青年，具有浓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思想的一群¹。据统计，1928年至1940年间，仅因课文涉及三民主义、爱国主义、反英反日等思想内容，被英国殖民政府禁止在新加坡华校采用的教科书就多达800余种——这一数据本身，恰好反证了中国教科书中所承载的五四思想内核及其强大的政治冲击力，也说明教材作为隐性课程的文本载体，始终在潜移默化中向华校生传递着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理念与家国情怀。

对于新加坡、马来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华族学童来说，晚清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出版的教科书，不仅传授了新的科学知识，还帮助他们塑造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现代”价值观。

（3）校园活动作为隐性课程的“实践场域”。

侨民教育时期至本土化转型初期，新加坡华校普遍开展戏剧演出、演讲比赛、读书会等各类课外活动，这些未被纳入正式教学计划的校园活动，并非单纯的课余消遣，而是隐性课程的重要实践场域，成为五四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影响华校生的重要载体。

早在1915年，养正学校学生便组织了白话新剧社，演出了《毒妇现形》《好男儿》《同恶有报》及《假狗案》，开本地学生演剧风气之先。据柯思仁统计，从1919年开始至1920年代，本地有多达40多所中小学校均举行了各类学生演剧。学生通过演绎五四题材戏剧、参与相关演讲讨论，不仅深化了对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认知，更在实践中践行着这些思想理念，使得隐性课程的思想浸润，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践行”，进一步强化了隐性教育的效果。正如梁著中总结的那样：

这场20世纪初期肇发于中国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运动，……，曾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为当时新加坡与马来亚半岛上接受过华文教育的一代人，在培养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自决的意识上提供了重要的养分。（p.32）

在梁著中虽未曾提及隐性课程这个概念，但其通过教师、教材、校园活动三大载体，完成了对华校生从认知到情感的塑造，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华文教育超越语言教学的深层价值，更承载了华文教育的文化传承与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正是梁著所聚焦的教育史之外，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具价值的隐性维度。

三、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

通过挖掘新加坡历史中华文教育的隐性课程的社会功能，探寻五四思潮与华校生政治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丰富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研究维度，更让我们教育的本质、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重新审视国际中文教育未来的发展。

1. 语言教育的本质从来不只是语言教育。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国际中文教育专

¹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language-education/pre-war-republic-of-china-textbooks-and-the-southeast-asian-chinese-1912-1941/>

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镜鉴：语言教育从来不是孤立的技能传授活动，其背后始终承载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身份意识的传递，这种教育溢出效应，有时比显性的语言教学效果更深远地影响着学习者的精神世界与思想意识形态。侨民教育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初衷是：传授华语、传承中华文化，但在隐性课程的浸润之下，五四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等理念传递给了华校学生，甚至将思想意识转化成为反殖民的政治行动，这一历史事实深刻表明，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教育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思想与价值的传递，这是语言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我们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技能、轻文化，重显性、轻隐性的倾向，我们不能将国际中文教育简单等同于汉语语言技能培训，不能只关注学习者 HSK 成绩的提升、语言表达的流畅度，而忽视了语言背后所附着的文化内涵、思想传统与价值理念的传递。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教材内容、教师言传身教、课堂互动等途径，接触并感知这些隐性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态度，甚至影响其自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选择，而这正是国际中文教育区别于普通语言培训的核心特质，也是我们专业的价值所在。

2. 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隐性课程理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隐性课程的益处效应，为我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我们应自觉将隐性课程的分析视角引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突破从教学方法到课程设置研究范式，拓宽专业研究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具体而言，我们的研究与实践，不仅要关注教材写了什么、教师教了什么、教学大纲要求了什么等等这些显性课程内容，更要关注学习者从课堂中、从教学实践中额外学到的东西——包括价值观的潜移默化、态度的悄然转变、文化认同的逐步建构，这些隐性因素，往往更深刻地影响着学习者与中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决定着国际中文教育文化传播、文明对话、文明互鉴核心目标的实现效果。

从研究层面来看，有必要加强对国际中文教育中隐性课程的系统性研究，深入探讨国际中文教育隐性课程的具体形态、运行机制与影响因素，分析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语境之下，隐性课程的呈现方式与作用路径差异；借鉴教育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教材选文、教师素养、课堂氛围、校园文化等隐性课程载体，对汉语学习者文化认知的影响，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理论深度。

从专业实践层面来看，我们应主动将隐性课程理念融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全过程。例如，在教材选择上，不仅要注重语言知识点的系统性，更要注重选文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导向，兼顾经典性与时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避免简单的文化符号堆砌；同时在教师培养中，引导教师通过言传身教来传递中华文化，在课堂互动中引导学习者正确认知中西方文化差异，避免生硬地显性地说教式文化输出。

3. 负责地理解和引导文化传播。我们强调注重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隐性课程与教育溢出效应，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隐性课程进行严格控制，更并不意味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恰恰相反，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有更自觉地文化传播伦理，在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开展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让文化传播既坚守自身内核，又能被学习者所理解和转化才是我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从业者需要持续思考和践行的核心命题。

首先,要坚持尊重差异、平等对话的原则。国际中文教育的学习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身份认同,我们在传递中华文化、开展隐性教育的过程中,不能持有文化中心主义的态度,既不能将中华文化视为唯一标准,更不能试图通过隐性课程去改造学习者的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引导学习者以平等对话的视角,看待中华文化与自身本土文化的差异,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让中文学习成为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让隐性课程成为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要坚持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传递的中华文化资源与思想传统,应是开放的、包容的,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也包括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与社会风貌;既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不回避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碰撞。在隐性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避免单向输出的模式,多采用互动式、体验式、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引导学习者主动接触、思考、理解中华文化,让他们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认知水平,自主解读和转化所学的文化内容,而不是被动接受标准答案。让文化传播真正成为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让学习者在尊重差异、平等对话中,实现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知与真诚认同。

最后,注重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尊重在地社会语境,实现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语境差异,若一味追求标准与统一,忽视在地社会的需求与语境的差别,必然会影响华文教育的效果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当代国际中文教育应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原则。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根据在地社会的文化语境与学生的需求,进行本土化调整,让华文教育更贴合在地实际;同时,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在本土化适应与国际化传播中寻求平衡。

结语

梁秉赋《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所呈现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历程,尤其是制度史之外的思想暗线、隐性课程,在丰富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研究内涵的同时,也为当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已进入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文化差异、身份认同、课程设置等诸多挑战,要自觉引入“隐性课程”分析视角,丰富专业研究与实践的维度,自觉树立文化传播伦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中华文化的负责任传播,纠正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中的偏差,提升专业实践的质量与水平,更能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内涵式发展。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ou Xia ^{ID}<https://orcid.org/0009-0003-9763-5888>

References

梁秉赋（2015）：《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

[Liang Bingfu (2015). *A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e Commercial Press.]

张西平（2009）：“国际汉语教育：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国际汉语教育》（01）：3-5。

[Zhang Xiping (2009).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 Critical Issue to Be Solved Urgent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01):3-5]

菲利普·W·杰克逊（2021）：《课堂生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Philip W. Jackson. (2021). *Life in Classroom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an Siew Keng (2010). *Education-At-Large: Oral Histories of Singapore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1950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郭惠芬（1999）：《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Guo Huifen (1999). *Chinese Migrant Writers and Singapore-Malaysian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李恩涵（2015）：《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

[Li Enhan (2015).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riental Press.]

黄晓蕾（2013）：《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uang Xiaolei (2013). *Research on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周聿峨（1995）：《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

[Zhou Yu'e (1995).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陈蒙鹤（2008）：《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广东科技出版社。

[Chen Menghe (2008).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Guangdong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李如龙（2000）：《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Li Rulong (2000).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s in Southeast Asi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易金浩（2021）：“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西部学刊》（09）：24-27。

[Yi Jinhao (2021).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Shift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Western Journal* (09):24-27.]

易淑琼（2024）：“从华校校歌的演化看新加坡华人身份建构——基于校刊文献的视角”，《世界民族》（03）：88-99。

[Yi Shuqiong (2024).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Singaporean Chinese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chool Song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Journal Documents.” *World Ethno-National Studies* (03):88-99.]

王赓武、郭梁（1983）：“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的华人教育政策”，《南洋问题》（03）：59-73。

[Wang Gengwu, Guo Liang (1983). “Chinese Education Polici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ce the 19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03):59-73.]